

谷風出版社

孫中山與 中國革命的起源

第一屆“哈佛大學
費正清東亞歷史獎”
共同得獎著作

革命

HAROLD Z.
SCHIFFRIN 原著
史扶鄰

邱權政 譯
符致興

孫中山

與中國革命的起源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 者：本社編輯部

出 版 社：谷風出版社

發 行 所：中和市景安路79巷15之2號

出版日期：1986年9月

再版日期：1987年4月

郵撥帳號：0777817—3 謝成忠帳戶

局版台業字第3649號

定價：200元

中譯本前言

金冲及

史扶鄰教授的《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一書，在近年來西方歷史學家對孫中山的大量研究著作中，要算是最重要的一部了。

本書一九六八年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出版社出版後，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重視。西方報刊紛紛發表評論，對它讚揚備至。有的說：“史扶鄰這本包括了孫中山頭四十年歷史的書，是西方學術成就中的里程碑。”“應該是關於孫中山青年時期的標準著述。”有的說：“這是本世紀學術成就中不可替代的、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著作。”美國的中國問題權威、哈佛大學的費正清教授特地為這部書作序，並說：“這部著作對一個嚴酷的時代中的重要人物所作的描述，是最詳盡和最具有權威性的。”

讀一讀史扶鄰這部著作，對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者來說，確實很有好處。它的好處，至少有兩點：第一，可以了解西方歷史學家對孫中山的研究狀況以及他們所持有的觀點。第二，也可以從中受到一些有益的啟發。這裡，着重就後一方面來說明。

史扶鄰這部著作第一個重要的優點是：富有歷史感。他把孫中山初期走過的道路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發展過程來考察，並且力圖探索和說明事情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發展。這就比某些歷史著作只要列一大堆歷史現象，或者作一些枯燥的靜止的分析，要深刻得多，對讀者也有吸引力得多。

史扶鄰在本書的《導言》中，一開始就給自己規定了明確的任務。他說：“（指孫中山）是由中國知識分子組成的政治運動的第一個非仕宦出身的領袖。本書的目的，就是要說明孫中

山是在什麼條件下怎樣取得這種領導地位的？”（見本書第7頁）
）本書以下各章，大體上就是按照這條線索漸次展開論述的。

孫中山是怎樣走上革命道路的？

長時期來曾經流行過一種說法：自從中法戰爭之後，孫中山便成爲一個堅定的革命者了。以後的一切，彷彿只是朝着他預定的目標前進。這中間，既沒有衝突，也沒有曲折。甚至連他上書李鴻章，也被解釋成只是借此北上，以窺清廷的虛實。這種說法顯然並不符合客觀的歷史事實。

一個人的思想發展，往往需要經過迂迴曲折的道路。特別是一種新的社會政治思想的產生，要衝破社會上各種傳統思想的束縛，更不可能一開始就走上一條筆直平坦的大路。當舊的統治勢力還貌似強大的時候，一個知識分子要下決心拋棄自己取得的已那點社會地位，冒着殺頭破家的危險，領頭起來革命，那裡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它不僅需要有一個嚴肅的思考和摸索的過程，而且當他最後下定決心前，內心常常充滿衝突，甚至會出現一些曲折和反複，這倒是很自然的事情。孫中山的青年時代，正是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

史扶鄰沒有採取那種簡單化的辦法，而是在相當程度上注意到了這個過程的複雜性。

他在描繪了孫中山“赤貧如洗”的童年時代和他在夏威夷受到西方式教育以後，接着指出：盡管他當時深深地爲自己民族的處境憂慮，熱望能革新中國的政治，可是直到他開始學醫的時候，他的內心依然充滿着矛盾。他學醫的決心，“表明他還不知道怎樣使他的職業同他的新的政治覺醒協調起來”。（第17頁）

當孫中山到香港雅麗氏醫院附屬醫校學習後，他開始同幾個友人高談革命，號稱“四大寇”。這就是孫中山自己說的：“此爲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史扶鄰正確地指出：在這時，還不能“過分強調孫中山在密室中反對清王朝的激進情緒”，“作爲一個接受了幾乎全部西方教育的人和一個現代醫學潛在的先行者，

孫中山所具備的條件使他將更多地求助於支持清王朝的改良主義者，而不是更多地求助於三合會。”（第 頁）

甚至到了一八九四年，也就是他已向陳少白、鄭士良等少數人提出過成立“興中會”的建議以後，他的內心依然存在着衝突：“有迹象進一步表明，在下決心從事革命活動之前，孫中山對於同改良主義的權貴結盟一事，曾作了最後的一次嘗試。”（第 31 頁）這個嘗試，就是一八九四年的向李鴻章上書。“然而，此行的失敗，終於促使他不再猶豫了。改良主義的可能性已被消除。從此以後，他唯一的目標就是推翻清王朝的統治。”（第 33 頁）

自然，在史扶鄰的論述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筆下的孫中山，總的說來，既不是什麼天生的聖人，也不是什麼單憑個人意志、隨意創造歷史的超人，而是一個使人感到親切的、可以理解的現實生活中的人。他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者；他又是在客觀形勢的推動下，經過內心的種種衝突，經過實踐的反覆探索，才最後走上革命道路的。史扶鄰對孫中山早期思想發展進程所作的這些基本觀察以及他的某些重要論斷，無疑對我們研究這個問題是很有啟發的。

我們再來看，在這以後孫中山又怎樣一步一步成爲當時中國革命黨人公認的領袖的？

考察這個問題，需要把視野推到更廣闊的領域中，不局限於對孫中山個人經歷的觀察和分析，同時要注意到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相交那十年間，整個中國所處的客觀形勢和內部社會力量配備發生了那些變化？

孫中山革命活動的開始，標誌着一種新興的社會力量開始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但在十九世紀末年，這種力量在國內的基礎還是太薄弱了，一時還不能構成一種可以在中國社會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力量。這種力量對比的狀況，自然導致孫中山自述中所說的：“由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爲革命進行

艱難困苦之時代也。”“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為怪者，祇有會黨中人耳。”到了二十世紀初年，兩個重要的變化發生了：一是經過甲午戰爭，經過八國聯軍之役，中華民族的處境更加惡化了。二是隨着國內近代工業的初步發展，隨着大批派遣留學生和廢科舉、興學堂，一個人數衆多的中產階層底知識分子隊伍空前壯大起來了。這是一個不同於舊式士大夫的新興的社會力量。他們在嚴重民族危機的刺激下，經過激烈的戰鬥，終於大批走上革命的道路。只有在這時，全國性的革命政黨成立的條件才告成熟。早就舉起民族民主革命大旗的孫中山，也就十分自然地成為這個革命政黨公認的領袖。

史扶鄰在相當程度上注意到了這個過程。

他指出：當孫中山開始革命活動時，他的經歷和所受的教養同國內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不相同。“他始終只是一個農民出身的持有外國學校畢業文憑的人。”書中作了一個有趣的比較：“在他那一代，也許還有別的中國人比他更熟悉西方的思想、語言和制度。然而，以孫中山來說，他是只靠西方的學識取得知識分子的地位的。其他的人先讀孔子和朱熹的書，然後才解釋達爾文和穆勒的學說。至於孫中山，誠如我們看到的，在他身上這個程序是相反的。”（第34頁）因而很自然，當時他的奮鬥只能是相當孤獨的。長時間內，在國內一般士大夫眼中，甚至“只把孫當成一個‘江湖大盜’，並且懷疑孫中山不識中國字”。（第260頁）“即使在惠州起義取得很大勝利後，傾向孫中山的也不是很多，而是很少。”（第261頁）

情況是怎樣發生變化的？史扶鄰表現了相當犀利的歷史眼光。他用很多筆墨，詳細地記錄了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新式知識分子隊伍迅速擴大、特別是留日學生人數急激增加的事實，並且刻劃了他們在這個時期思想上從愛國到反滿的迅速變化。“而當他們最後的抉擇是反滿時，孫中山的主張也就變得比較容易接受了。”（第221—245頁）

對這個過程的論述，是史扶鄰全書中用力量最多的地方，構成了全書的基本特色所在。儘管其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論斷，但應該說，這個敘述大體上是接近客觀實際的。他在《導言》中，早就提出“本書的目的，不就是要講明孫中山是在什麼條件下怎樣取得這種領導地位的”嗎？應該承認，本書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歷史考察，至少提供了一種比較系統的、能夠自成一說的答案。

史扶鄰這部著作第二個重要優點是：他把個人傳記同對當時整個歷史環境的考察結合起來。寫的雖然是孫中山的傳記，讀者却從中看到一個時代，並且多少感覺到了時代脈搏的跳動。

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自然是前面剛說到的，他在論述歷史進入二十世紀時，特地拿出兩章的篇幅（第九章《學生和流亡知識分子》、第十章《民族主義和革命的語言》），來描寫當時聚集在東京和上海的知識分子的狀況和他們的思想變化。孫中山本人的活動在這兩章裡幾乎完全沒有提到。這是不是離題了呢？不是。因為不了解這些，就不可能懂得同盟會怎麼會產生，也不可能了解孫中山怎麼能成為當時革命黨人公認的領袖。

就是對一些具體歷史事件的論述，史扶鄰同樣也很注意對當時歷史環境的描寫。例如，在《一八九五年的廣州社會帶來的巨大動蕩。這對幫助讀者了解孫中山為什麼能組織和發動這樣一次起義？他所依靠的力量是什麼？無疑都很有必要。再如，他在敘述孫中山在夏威夷求學的經過時講到：“由於意奧蘭尼書院支持夏威夷的獨立事業，抨擊親美的吞併主義者的圖謀，因此，它也許應對孫中山後來產生亞洲人必須抵抗西方侵略的政治觀念負責。”（第 頁）而當講到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孫中山創立檀香山興中會時，又指出：“在籌備成立興中會的那幾個月裡，夏威夷變成了一個共和國。新憲法在一八九四年七月生效，孫中山和華僑中那些具有政治覺悟的人，對於伴隨這個共和國的誕生而來的政治變革是不可能不在意的。”（第38頁）這些地方雖然只是寥寥數筆，却都表現了作者具有相當敏銳的歷史眼光。

把傳記主人公的個人經歷同他當時所處的整個歷史環境結合起來考察，必要時甚至不惜以較多筆墨來專門描述並剖析這種歷史環境，應該說，這是一部好的歷史傳記作品必須具備的條件。因為：第一，只有這樣才能使讀者對傳記主人公在各個時期爲什麼會這樣或那樣地思考問題和採取行動，得到一個比較正確的了解，而不致把它看作只是個人隨心所欲的決心。第二，才能使讀者對傳記主人公在整個歷史變動中所占的地位作出比較客觀的估計。第三，還可以使讀者通過閱讀這部著作，從一個側面看到整個時代，從而獲得更豐富的歷史知識，領略更多發人深思的歷史教訓。史扶鄰在這方面所作的努力，對我們也是很有啟發的。

史扶鄰這部著作第三個優點是：他在寫作過程中，勤奮地搜集了他所能得到的一切歷史資料，其中包括當時的外交檔案、警察報告、外文報刊，以至個人訪問材料等等。並且對他得到的資料，尤其是相互並不一致的資料，進行了認真的考訂，作出自己的判斷。

對我國讀者說來，特別容易引起興趣的是，這部著作中引用的大量英國政府和香港當局的檔案、當時外文報紙上的評論、報導和其他外文材料，以及經過作者細心的分析比較後得出的結論。這對我們了解某些歷史事件的真相是很有幫助的。

舉例來說：惠州起義時孫中山的軍事部署是很違反常理的。他突然改變計劃，命令起義部隊不要向廣州進發，而向廈門轉進。爲什麼這樣做？孫中山自己有過一段解釋：“時台灣總督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也，乃飭民政長官後藤與予接洽，許多起事之後，可以相助。”看了這段解釋，人們仍然留下不少疑團。史扶鄰的著作中引用了直接參與其事的山田良政的弟弟山田純三郎對這個事件的詳細敘述。並且一針見血地指出：“而更爲可能的是，日本人對廈門的騷亂比對廣東的騷亂更感興趣。八月和九月，他們全都做好了接管廈門港的準備。倘若孫中山來接管，特別是如果他擅自取用這個銀行的金庫，那

麼他們就會處於有利的地位。”“關於日本人密謀在八月底奪取廈門，以及後來因擔心歐洲輿論的反對而放棄這個密謀的討論，也見英國人關於八月二十四日日人在廈門挑畔的報告。”（第213頁）

這下事情就很清楚了。兒玉佈置的原來是一個圈套。要是孫中山真的聽信後藤那些諾言，進入廈門，動手取用台灣銀行的金庫，日本當局就可以以此作為藉口，出兵“奪取廈門”。後來只是“因擔心歐洲輿論的反對”，才“放棄了這個密謀”。這就使我們對這個歷史事件能有一個比較正確的了解。

在第五章《倫敦蒙難》中，史扶鄰教授引用了大量英國政府檔案和英國報紙記載，對這個事件的前後經過、包括許多細節作了詳盡的描述。在第七章《李鴻章、卜力與何啟》中，他以同樣豐富的資料，詳細地描述了義和團運動期間英國政府在華南地區的種種政治策劃。這些，也都是很能引起中國讀者興趣的。

自然，史扶鄰教授作為一位西方的學者，他的某些觀點和我國學者是不同的。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當他論述的問題涉及到更廣泛的歷史領域時，也難免使人感到有隔膜或不足的地方。

放在中國近代歷史面前一個最突出的問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特別是中日甲午戰後，這種危機空前地激化了。帝國主義列強紛紛撲到中國來，恣意踐踏中國的主權，掠奪中國的財富。亡國滅種的現實威脅，像一個可怕的陰影，時刻籠罩在每個愛國者的心頭。怎樣把國家從這樣危急的局勢下挽救出來，走上獨立富強的道路？成為當時中國的先進分子考慮一切問題的根本出發點。

孫中山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者。國外的生活和所受的西方近代教育，使他對中國危急的命運和進行根本改革的必要性有着更痛切的感受。長時期內，他苦心焦慮地尋求拯救國家的道路。一切其它的嘗試都失敗了。這就不能不驅使他最終下定決心，拿起武器，走上革命的道路。救國，必須革命。這正是孫中山從自己切身經歷中得出的結論。

史扶鄰在描述孫中山怎樣開始他的政治活動時，並不是沒有提到嚴重的民族危機對它的刺激作用。但是，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到，他所著重論述的還是西方教育、以至西方社會生活對他的影響。他強調：“孫中山的故鄉的地理位置，特別是十三年外國的正規學校教育和專業訓練，把他推向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一批歐化了的、思想激烈的人們一邊。”（第34頁）從而得出結論：“他只是西方基督教傳統的理性的和精神的產物。”這就未免有些本末倒置了。

我們再來看一看書中對二十世紀初留日學生的狀況和思想變化的論述。史扶鄰雖然用了整整兩章的篇幅來寫這個問題，但它的缺點是失之籠統。很難從中清楚地看到：當時客觀形勢特別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形勢的發展，怎樣一步步地直接推動並支配著留日學生中的思想變化。書中沒有指出：當時衆多的留日學生，儘管是在嚴重的民族危機下抱著尋求救國道路的心情遠赴日本求學的；可是，在最初幾年，除極少數激進分子外，絕大多數人的政治態度還是比較溫和的。他們認為，中國要達到獨立富強，應該發揚民族主義精神，而目前先得從教育著手，進行“學戰”，才是根本的出路。造成留日學生中大多數人政治態度變化的重大轉折點，是一九〇三年夏的拒俄事件。這時，俄國揚言要吞併中國的東北。在廣大愛國青年看來，這就是強烈動手瓜分中國的信號，從而激起了十分強烈的反應。他們懷著極端悲憤的心情，自動組織拒俄義勇隊，要求在清朝政府統率下武裝抵抗俄國。可是，腐朽的清朝政府却指責學生“名爲拒俄，實則革命”，悍然加以鎮壓。這不能不極大地激怒了原來就群情激憤的愛國學生。於是，留日學生中的政治傾向倏然爲之一變。革命的要求，頓時上升到主流的地位。本書第十章《民族主義的和革命的語言》，把二十世紀初年直到同盟會成立前留日學生的思想狀況混在一起加以論列。給人的印象，仿佛拒俄事件以前和以後留日學生的政治狀況和思想狀況並沒有發生多大變化。這就難以使人對事件的

發展得到比較完整的、深刻的認識。

還需要談到：中國近代社會的變動實在太急速了。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層出不窮地出現，缺乏現成的解決辦法可供採納。孫中山在這樣急速的變動中，對許多複雜的問題常常需要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和摸索的過程。有時還會出現徬徨或陷入迷途。這是毫不足怪的。例如，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狀況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但一段時間內，孫中山聯絡的重點還是放在會黨方面，對知識分子工作的重視却很不夠。直到一九〇五年初同旅歐學生進行一次激烈的爭辯後，才發生顯著的變化。又如，在策劃歷次武裝起義的過程中，他曾試圖從各方面尋求借用力量，其中包括對某些帝國主義國家和國內舊勢力抱有過不切實際的幻想。這些，自然是他的弱點所在，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史扶鄰却把這些一再稱作孫中山“個性上強烈的實用主義傾向”。這是不很公允的。

此外，這部著作中偶爾也有一些史實上的錯誤。例如，在義和團運動期間，改良派的《清議報》上對義和團始終篇累牘地進行謾罵攻擊，甚至把它稱爲“國民之公敵”，主張借外國的兵力以“平團匪”、“迎我皇上復政”。至於公開頌揚義和團功績的《義和團有功於中國說》，却是革命派的刊物《開智錄》所刊登的。這篇文章，《清議報》也沒有轉載，只是以後所編的《清議報全編》的《群報擷華》一樣把它收入了。史扶鄰說：“在評價義和團的功績方面，又是梁啟超的一個刊物率先發出一種肯定的新調子。”（第252頁）這種說法，至少是不準確的。但一位外國學者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著作中偶有這樣一些失誤的地方，自然是不能過於苛求的。

1980年4月

中譯本序

在向本書的中國讀者致意時，我想說明為什麼孫中山的生平近二十年來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首先，孫中山個人的英雄氣概和勇敢的品質，使他成為一個令人着迷的研究對象。像他這樣由出身微賤而譽滿天下的人，在歷史上極為少見。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孫中山的基本信念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那麼，他如此堅決地加以肯定的持久的信念是什麼呢？

首先，孫中山比他那一代任何一個中國人都相信，一個虛弱、分裂和落後的中國是不正常的，而且這個國家沒有理由不在世界上很快取得她的合法地位。第二，他同樣相信，一個強大、統一和現代化的中國，不僅對於中國人民的幸福，而且對於世界和平與繁榮都是必不可少的。第三，孫中山堅持認為現代中國不應盲目抄襲西方和日本的經驗，而應該在設計自己的發展計劃時避免早期現代化國家所犯的錯誤。於是他產生了一個想法，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吸收社會平等原則，這樣就不只是少數特殊階層分子，而是全體人民都得到物質進步的好處。

在本書所論述的孫中山一生經歷的早期，他就已經持有這些見解了。這些已經得到證明的見解，確鑿地證實了他的非凡的預見，這是一個真正的民族英雄的標誌。

史扶鄰

一九八〇年五月

原書序

對於研究 1895 年至 1905 年間孫中山在中國近代革命過程中的崛起，本書的研究成果遠較以往的同類著作明晰流暢且易於使人理解。哈洛德·史扶鄰不只利用了豐富的有關孫中山早期活動的中文資料，並且使用了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可利用的社會與政治科學的研究方法以分析孫崛起時變動中的中國社會。本研究成果描述了孫當時如何面對日復一日的機會與挑戰；同時，也使讀者們了解當時蘊育時代潮流的動力是什麼，此一潮流正是孫所依隨者。自 1934 年 Lyon Sharman 完成他的開創性研究——“孫逸仙他的生平與意義”〔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1934)〕迄今，有不少中、日文及西方語文的研究資料已被發現可供研究參考。人們現可更精細地描述孫的傑出生平活動與崛起的环境。

在兩個世代後的今日，回溯中國未完成的革命的第一階段，我們已可較當日的西方觀察家深入地了解當時的歷史變化。1898 年時，西方人認為“中國的瓜分”即將來臨；時至今日，我們可看出當時以強大聚合力出現的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遠較西方帝國主義雄渾有力。但惟能試著把我們自己想像成為受儒學教化的精英分子——在當時他們仍認為惟有他們才能拯救中國——否則我們仍無法真正地體會當時的時代壓力與步調。

惟有借用上述的想像，今日人們才能體會 1890 年代末沖擊中國的“災難”。中國人活在自給自足的生活架構裏，早在若干世紀以前文化即已相當成熟高明，但忽然間她的基礎竟支離破碎了。1894-95 年中日甲午戰爭日本的勝利劇烈地震撼了中國人，其程度遠較 1860 年時通商口岸（條約港）制度的出現為甚。1834 年以後的數十年間，英國大挫清朝的銳氣，最後終於使中國不再

擁有較其它列強優越的地位。一旦西方獲得治外法權、租界居留權、內陸旅遊及傳教權、內河航行權、定額關稅特權後，西方人的出現逐漸地被中國人視為制度的一部分。1860年以後清帝繼續其統治，一個個的變亂均被鎮壓下去了。科學考試確認儒家仍為正統，西洋的武器與物質文明逐漸被接受與引入；但就理論上來言，它們只是被用來增強清廷的力量以對付外來侵略的手段而已。

1895年的劇變顯示既存制度須有所改變，否則中國可能會被毀滅。許多新生代的知識分子開始尋找一位新的領袖。他們首先發現了“當代聖人”康有為。康於1898年時成為年輕的光緒帝進行維新時的首席顧問。當時，這些新生代知識分子所聽到的孫中山只不過是一個低階層傳統農民組成的秘密會社的“陰謀家”，或者是一位活動於香港、澳門等外人港口及海外華僑商界的人士而已。

孫與康除了均出生於廣東及同時憎惡慈禧太后所代表的勢力這兩點外，二者少有相同點。二人在1899年後成為如此相互對立的反政府組織者之事是此一變化的指標。康是一位傑出的具有創造力的學者，盡全力地給予儒學新解釋以應中國當代之需。但在1898年得到百日維新的機會，以皇帝詔令調整政府時，他便無法把自己轉化成一位反政府組織的領袖。他是一位只能給皇帝予顧問的“聖人”，仍是儒學傳統的圈內人，而無法使自己成為一位英雄。然而，康的年輕對手——孫中山——一位普通人與政治的局外者，就某種程度而言，在1896年時已成為國際新聞界的英雄了，到了1905年時，他已具備了“聖人”的姿態。他以國家領袖身份的出現戲劇性地象徵了康有為所代表的儒學政治傳統瀕於崩潰。

1960年代時，對美國人來言孫的成為領袖是一件具有特殊懷鄉情感意義的事。因他是一位能說英語的中國主要領袖，並熟悉舊金山、紐約、倫敦等城市（蔣與毛在有生之年曾見過莫斯

科，但未見過西歐與美國)。簡而言之，孫代表他那一世代的中國人不只一次地向當時較先進的西方世界尋求援助與激勵。從我們這兒他獲得了基督教的洗禮與道義上的支持、民主信條、個人主義、科技與工業知識。他未得到的是如何在政治上把中國組織起來的訣竅而已。在他晚年時，他認為美國有負於他的期望；但在 1895-96 年與 1903-04 年間，早在環遊美國時，他則是充滿了期許之情。與日本相同，西方是他成為領袖的主要因素之一。的確，孫中山本人代表了外在世界對中國的正面影響。這一點無疑地促使史扶鄰這位西方歷史學家能較容易地如此卓越明晰的觀點來描述孫的早年活動。

哈洛德·史扶鄰在 1945 年時於柏克萊加州大學獲文學士學位，1956 年於同校獲碩士學位。1961 年時他在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目前執教於該大學。他於柏克萊開始此一研究工作，並繼續之於耶路撒冷。在研究過程中又旅行於倫敦、香港、台北等地，最後才在哈佛大學花了九個月完成本書。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對此一研究特有興趣，藉此機會讓我們對此一有助於我們對中國革命的了解的基礎性貢獻表示讚賞。

費 正 清

J. K. Fairbank

目 錄

中譯本序

原書序

一、導 言	1
二、孫中山：早期的影響	9
三、興中會的建立	36
四、一八九五年的廣州密謀	49
五、倫敦蒙難	85
六、東京。對大陸的重新滲透	123
七、李鴻章、卜力與何啟	157
八、惠州起義	187
九、學生和流亡知識分子	221
十、民族主義和革命的語言	245
十一、孫中山：一個新的轉折	260
十二、建立同盟會	298
書目索引	318

一、導 言

在長達三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孫中山從未領導過一個統一的中國。因此，他的治國之才和決策能力無從考察，但這更加使他死後成爲傳奇式的人物。他和同時代的大多數政治家不同，他沒有利用政治來爲個人掙得一筆財產。他曾爲遠大的目標——一個現代的、強大的、獨立的、民主和平等均富的中國而奔走呼喊。雖然這些目標尚未變成政策條文，但作爲口號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孫中山長期追求權力的失敗也具有代表性。回顧過去，中國民族主義所受的挫折，在他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體現。每一個與中國的軟弱和落後互爲表裏的人都出賣他：文人學士、官僚、軍閥，特別是列強。

孫中山“革命尙未成功”的遺產，吸引了許多人對它提出要求。這些人包括國民黨的各個人物、中共、“好”軍閥，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侵略者。今天，北平和台北都競相引用孫中山的話，以使他們各自對孫中山的評價永世長存；而莫斯科，則在對北平的指責中，稱孫中山是尋求“同蘇聯友好”的“中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①

著名的領袖和偉大的思想家們都傾向於留下有爭議的遺產，在莫斯科和北平這是衆所周知的，對孫中山的評價在這兩個地方

① 德魯森《孫中山》[31]，第19頁。作者和書的全名見第320-342頁的書目。注腳只引簡稱，括號中的數字即書目中編排的數字，如[31]指書目中的第[31]條。